

军 绅 政 权

——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

陈 志 让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111
E3
234

军绅政权

——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

陈 志 让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军 绅 政 权

——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

陈 志 让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5.5印张 129,000字

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500

书号11002·558 定价0.55元

序

三十多年来，我从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史转向政治军事史，现在又回到社会经济史。在这一段漫长的时期中，我逐渐明白了我想找的答案，一个是为什么中国近代化的途程中有那么多荆棘，另一个是那些荆棘怎样能扫除干净。也是逐渐地，我认识了前一段路程上的荆棘是一八六〇——一八九五年的绅——军政权；后一段路程上的荆棘是一八九五——一九四九年的军——绅政权。本书分析的就是一九一二——一九二八年之间的军——绅政权。

我所指的军是一八九五年以后渐渐发展的军队，有时也考虑团防和土匪；我所谓的绅(缙绅，士绅)是受传统教育，有功名的人。有些任过政府的职位，有些拥有田产地产。军——绅政权是这两种人联合统治中国的政权。

绅——军和军——绅政权有一个共同之点，那就是派系的分裂和无限制的斗争。这个特点后来在国民党中继续发展。两种政权的权力基础都是土地，由控制土地掌握资源来养兵。两种政权也就因此而要保卫中国的文化传统。他们对近代文化最大的让步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本书是一九七八年四月到七月在京都大学文学部的讲稿改写而成的。那时我能到京都是由于日本学术振兴会经济上的帮助。在这里我正式向学振会道谢。邀请我的是京大文学部长岛田虔次和人文科学研究所竹内实两教授。他们邀请的盛意和招待的周到，我衷心感谢。

京大是日本研究东洋史(中国史)一个重要的学府。在那里跟岛田,竹内,以及狭间直树,小野和子,森时彦诸先生,时常切磋讨论,更加上人文科学研究所丰富的藏书之助,那四个月不成问题是我一生中收获最大的一段时期,我感谢他们,也感谢人文科学研究所其他的朋友们。

在美洲对我的分析影响最深的一本书是 A. J. Nathan, *Peking Politics 1918—1923* (California, 1976)。本书的七,八两章中很容易看出 Nathan 教授的影响。我的同事 Diana Lary 教授和我的研究生 Anthony Chan, 时常讨论有关军阀的问题,对我的了解有很大的帮助,也在此一并致谢。

不用说,一切的缺点和错误是我自己的责任,也请读者指教。

陈 志 让

多伦多,一九七九

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的政权形态是绅军政权;解放以前是军绅政权。本书分析的是军绅政权的形成和它在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用以解释在军阀统治之下,中国之所以不能现代化的原因。

本书作者是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历史系中国和日本近代史教授。英文著作有《毛泽东与中国革命》,《袁世凯》,《中国与东南亚社会史》,以及关于义和团,共产主义运动,军阀,毛泽东思想等论文。本书英文版及日文版分别在加拿大和日本出版。

目 录

序

绪 论1

第 一 章 政治的离心力(1900—1911):官,绅,军队9

第 二 章 政治的离心力(1912—1913):各省.....16

第 三 章 南北之分24

第 四 章 内战的形态.....34

第 五 章 联省自治59

第 六 章 士兵71

第 七 章 派系与内政87

第 八 章 派系与外交95

第 九 章 法,统(宪法与传统)105

第 十 章 财政与军费113

第十一章 社会结构的变迁128

第十二章 文化的趋势:守旧与现代化140

第十三章 军阀的仇敌150

第十四章 结论159

附录:军官团与军官团的精神164

绪 论

定义，范围，方法

近代军队主要的任务在保卫国家主权的完整。一方面对付外敌侵蚀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一方面对付内敌分割政府统治之下的土地与行政权。“敌”由国家最高政治负责人或负责的机关来决定，不由军队自己决定。这就是说，军队服从最高政治领导的命令，因此而产生统一的指挥和管理系统。这才是国家的军队，统一的军队。

这样的近代军队从民政机构取得军饷，给养，装备。它本身不干预民政。用中国军阀时代的话来说，就是军政和民政分开，军民分治。

近代的军队另一个任务是训练，教育在役的士兵，使他们在退伍之后有职业训练和就业的资格和能力。这样，军队是一个大学校，对国家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能提供积极的贡献。如果这个国家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军队也能因此而对现代化有所帮助。

但是一九一二——一九三七年中国的军队，既不对侵蚀中国领土主权的外敌保卫国家的主权，（十九路军上海之战是例外。）而又自己决定谁是“内敌”。即使有中央政府来讨论决定谁是“内敌”，那个中央政府也常为军人所操纵。一个军人集团所操纵的中央政府，也常常受到另一个军人集团的反抗。许多大小军事领袖的行

动不受最高政治领导人或领导机关的指挥。这时期中国没有统一的军队，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也没有统一的军队管理系统。

这样一来，各个军事领袖必需在不同的程度上自筹军饷，于是不得不干涉民政。这是私人军队形成的基础。私人的军队和私人企业有些相同的地方。军官的主要考虑是筹饷来养兵；士兵和低级军官的主要考虑是当兵来找一条生路。能干的军官好象能干的企业家，能多找钱使军队的粮饷充足装备精良。钱多半来自农业，所以土地和农民变成了私人军队必须控制必须争夺的对象。私人的军队也必须控制一个区域中的民政系统，才能从那个区域中取得养兵所需的资料。

在贫穷的经济状况之下，能取得的养兵资源不多。这些私人的军队只能做到粮饷，装备，服装，没有余力兼顾士兵的医药，教育，文化生活，更没有余力照顾军人退伍以后的生活。这样的军队对国家的现代化无益有损。

中国产生了这样的军官和军人，就是军阀时期一切主要问题的来源。

定 义

在中国以外研究中国问题，不能不考虑中国人，尤其是当时的中国人，对他们自己的问题的看法。那是他们对他们的问题的了解，那样的了解对问题和问题的处理显然有很重要的影响。如果不考虑这一点，中国问题会变成外国人所了解的中国问题，会多多少少地失去了问题的真实性。但这只是真假的问题，不一定是对错的问题。如果中国人对他们自己的问题了解得既真实又正确，那么我们这些外国人又何必对中国问题插嘴？

远在一九一三年，梁启超就注意到中国的分裂，他称之为

“部落思想”。他说：“惟见亚细亚大陆东部有二十余部落，各部落之中又有其小部落。”^① 这些梁启超的“部落”到一九二〇年代初才被一些学者直呼为“军阀”。^② 但那时的官方文件，例如一九一九年南北和平谈判的文件，还说那不过是“集团统治”，既不是“部落”，也不是“军阀”。

到一九二二年直系奉系战争时期，张作霖与吴佩孚彼此说对方是“军阀”，^③ 但是自己还不承认自己是“军阀”。他们的看法是，自己在那里谋求国家的统一，消除统一的障碍。统一的障碍是“军阀”。那种人祸国殃民，无人道，无法纪，既不合于中国的传统道德水准，也不合于国家的法律。

国民党在一九二四年改组，改组之后不用阶级分析而仍然用民族主义的分析方法来看军阀问题。^④ 那时国民党领导人认为军阀有三个特点：（一）不顾国家利益，而且勾结帝国主义，依附于帝国主义；（二）不顾民众利益，自筹军饷，而且剥削人民以自肥；（三）不知有主义和党，不服从最高行政负责人或负责的政治机构，以致军队的指挥和管理系统不统一。

一九二四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沿用共产国际的定义，^⑤ 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说明军阀是依附于帝国主义又得到地主阶级援助的军人，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指挥和管理系统是否统一，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定义中最主要的部分；那样的半殖民地

① 《一年来之政象与国民程度之映射》，《饮冰室合集》，一九三六年文集卷三十，十七页。

② 《胡适文存》，一九五三年，二集，卷三，一一一页；《陈独秀的意见》，见《胡适文存》，同卷，一〇九、一二二页。

③ 崇文书店编《辛亥革命研究论集》，第二集，一四六、一六〇页。

④ 《革命文献》，卷十四，五六三——五六四页；卷十六，四十六页；《汪精卫集》，一九二九年，卷三，一三八、一九〇页。

⑤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案》，七十八页。

半封建军队，即使指挥管理统一也是军阀的军队。这样的定义，可以用于袁世凯，也可以用于蒋介石。把军人和地主合成一个统治集团，比较合于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定义。从这样的定义才演变出毛泽东的定义：

“脱离群众（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的领导，如象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①

我们所采用的定义是：（一）中国从所谓的绅士或地主的政权建立之后，实际的政权基础是绅士和军人的联合，那是绅——军政权。但是在一九一二年以后，军人的势力壮大，中国的行政机构从上到下，却变成了军人领导绅士的政权。北京的总统，总理，国务院，国会受军人操纵；各地方的县长，乡长也受军人的操纵。这种政权我们叫作“军——绅政权”。（二）这种政权在朝代递换时期也有过，但是中国近代军阀勃起于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以后，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觉醒以后的军队和军阀。（三）但是，这些军阀和“军——绅政权”不保卫国家主权的完整，民族主义对他们的影响似乎并不大。（四）他们在一九二三年曹锟当选为总统以前，不服从最高政治领导人或领导机构的命令；在曹锟当选为总统之后，直接操纵最高的政治领导机构。指挥和管理系统一直不统一。（五）于是他们自筹军饷，拥有防区或行政区，强迫行政区筹集军饷。

这样的军队不同于中日战争以前的湘军淮军，因为湘淮军还是由文人（绅士）行政长官所领导的军队，指挥和管理系统相当统一。军队的粮饷，装备仍然由行政长官负责，行政长官由中央政府任免，中央政府还不是由军人操纵的政府。湘军为了对抗内

^① 《毛泽东选集》，卷一，八十八页。请参看波多野善大，《中国近代军阀的研究》，一—〇——三一—页，一三四——一三五—页，二七七——二七八—页。

敌而组成，淮军为了保卫国家的主权而对外敌作战，而且一八九五年和一九〇〇年为了对抗外敌而惨败，消灭。内敌外敌都是由最高的政治领导所决定的。

国民党的军队是否是军阀的军队哩？一九三七年以前的国民党军队也不保卫国家的主权，甚至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东北被侵略时也不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国民党的军队仍然分作许多派系，指挥不统一，管理也不统一。待遇有差别，嫡系的军队和所谓的“杂牌”队伍，待遇很不同。因此许多军队不得不自筹军饷，占据防区；因此各派军队之间时常有内战。

把范围缩小一点来看，蒋介石的军队是否是军阀的军队？除了上述的几个特点之外，他的军队是否是军阀的军队，得看“合法”与“不合法”。国民党政府的最高政治领导由蒋介石本人操纵，那个政府没有宪法的根据，没有经过民选。它的“合法性”不以法律为根据，而依靠外国的承认和国内的一些大的政治势力的拥护。

团结国内那些政治势力的理论是三民主义，组织是中国国民党。党之所以能为最高的政治领导，因为三民主义上规定了一个“训政时期”。在训政时期，党的工作在训导人民，不在发动人民参政。这样一来党变成了传统的绅士阶级和新兴的资产阶级所拥护的组织，而这些人又受大军人的操纵。蒋介石的政权基本上还是“军——绅政权”，同时加上一些资产阶级领袖们的支持。一九三七年的中日战争，迫使蒋介石的军队为国家主权而战，那就是所谓的“牺牲到了最后关头”。在那次战争中指挥系统趋向于统一。除此之外，自筹军饷的办法并没有完全停止；基本上的“军——绅政权”也没有怎样改变。

尽管在外表上跟军阀时期的军队不同，但国民党各派系的军队，甚至蒋介石的军队，仍然是军阀的军队。

范围，方法

虽然在以后的十四章之中，我们会提到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以前和一九二八年北伐结束以后的事，这十四章主要的范围是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八年之间的发展。有的人以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和一九二八年蒋介石执政之间为中国军阀的统治时期，这样的分期不能说明中国近代军——绅政权的形成，也不能解释它的衰落。

在这样的时间范围之内，我们分析的不是军阀史，而是军阀时期的历史。我们所用的不是传记方法，传记只能包括少数重要的军人。如果以旅长以上这一个时期的军人为军阀，我们应该考虑的有一千三百个军阀。差不多关于所有的这些军阀，我都收集了一些资料。这些资料不能看出他们每一个人发展的经历，但可以看出他们大体上发展的轮廓。许多小军阀，在乡下，在偏远的地方剥削人民的军阀，跟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张宗昌很不一样。研究军阀时期的历史，也应该考虑到他们。

我们自然也应该考虑士兵，没有士兵也就没有军队和军阀，而军阀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养兵。兵养得愈多愈好，军阀的权力也就愈大；一旦释了兵权或失了兵权，军阀连自己的生命财产也难以保存。失掉了兵权的军阀的处境比破了产的企业家更危险。

我们不怎么样注意军队的编制，训练，驻防，战略战术，装备等等，因为这十四章不是纯粹的军事史。我们要分析的是军阀时代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的变迁。这些变迁产生了军阀，也因为军阀而促成了变迁。我们的任务在于分析这些变迁——原因，形态，过程，和结果。

一方面我们注重结构的变迁，另一方面注重思想的变迁。某

些政治，社会，经济的结构在军阀时期衰亡，某些其它的结构在发展。某些思想被遗弃，某些思想被接受。军——绅政权是促成这些变迁的一支强大的力量，它也刺激起反抗的力量。两种力量的角斗促成了新的变迁。

军阀时期一个显明的特征是“分崩离析”——政治，社会，经济都分为派系，或分为省和省以内的区。我们把这两种分裂叫作“派系”和“地区”，也不妨叫作“派系主义”，“派系观念”和“地区主义”，“地域观念”。这当中又有结构和思想的问题。这两种观念代表各种势力，包括各种结构和思想。

这样的“分崩离析”是否等于中国史上的“战国”，“南北朝”，或“五代”？“战国”是中国统一以前的事，向着中国的统一而发展。“南北朝”和“五代”是中国已经统一以后的事，但是在中国民族主义觉醒以前的事。近代中国造成的“分崩离析”，是以民族主义勃兴为背景的。这是近代中国分崩离析不同于先前的分崩离析的地方。

那么，我们可否把军阀割据跟民族国家分割世界来比较？能否把中国当作世界的缩影？能否把省或防区看成一个一个的独立国家？

我们的看法是：（一）派系和省区都不是独立的主权单位。省或区宣布过“独立”，也取消过“独立”，但他们所谓的“独立”跟民族国家的独立不同。他们“独立”的主要考虑是某一个时期的中央政权，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不能代表他们所了解的“合法”或“正统”两个观念，也就是不能使他们的权力“合法”或合于“正统”。一旦中央政权合于他们的要求，“独立”也就取消了。（二）中国的中央政权不等于国际联盟，也不等于联合国。北京或南京的中央政权应当能代表“合法”“正统”，应该是“合法”与否的最高决定者，国联和联合国却都没有那样的作用。国联或联合国只能决定

国际行动是否合法，不谈正统，也不管“内政”是否合法。也许有人会说国内的种族歧视政策会引起联合国的干涉，但干涉的方式跟中国中央政府干涉各区内政的方式很不同。(三)最不当的是，如果把中国的分崩离析看成一个国际体系，那么帝国主义又放到哪里去呢？是否在内战(等于国际战争)之外，还要加上“星球之间的战争”哩？

第一章

政治的离心力(1900—1911):

官, 绅, 军队

中国在中日战争中败北;三十年的洋务、时务政策破产了。破产之余,最大的危机是半新半旧的淮军的消灭,使绅士政权对内对外都失去了屏障。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太平天国和捻军横扫中原。那时恭亲王的“善后章程”要中国以暂时对外和平,取得喘息的机会,努力平定内乱,然后发奋图强为长期政策。一八九五年,中国虽然没有大规模的内乱,但列强瓜分的局面岌岌可危。大政方针必须改变。当时一致的意见是中国必须重新练兵来保卫绅士政权;当时不一致的意见是民政方面如何改弦更张?

一八六〇年代意见也不一致,但限于官吏之间。一般在野士绅对行政人员,行政人员自己对自己,都具有相当高度的信心。一八九五年意见的不一致,不限于行政人员之中,在野士绅对行政人员发出了严厉的批评。在朝在野的士绅都认为中国必须变才能自保,但是保的是什么?变到什么程度?

一八九五年《下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等人正在北京参加考试。他们的联合行动就是所谓的“公车上书”。他们所建议的有:(一)迁都继续作战;(二)变法以图强。他们正面地或旁敲侧击地对行政人员提出批评。这一个变法运动发展为一八九八年的“百日维新”,主张扩大政府的基础,包括在野的士绅,参

加政治讨论。他们主张立宪，把承天命以统治天下的清朝改为顺民意以统治中国的民族国家。他们也主张改变考试制度以选拔新式的治国人才。这样的改革方案就是当时保守的政治势力所谓的“叛逆”，因为他们要保的是中国，不一定是“大清”。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中国民族主权的完整，不一定是中国文化主权的完整。

“百日维新”之后，保守的政治势力受到外国势力（Salisbury 侯爵所谓的“租借权之战”）和农民（义和团运动）反抗外国势力的双重压迫。保守派的看法是，如果不顺应民意，那么中国就无以立国。在义和团战争中，使保守派政府最为心悸的一个新发展是“东南自保”。山东的袁世凯，两江的刘坤一，两湖的张之洞，两粤的李鸿章都拒绝卷入战争的漩涡。

“百日维新”象征着在朝与在野士绅之间有了裂痕；“东南自保”象征着在朝士绅之间有了裂痕。统治阶级本身的裂痕是统治阶级最关心的事。

保守派在一九〇一年北京和约之后，不得不对新的绅士势力让步，这才有一九〇〇年代一系列的改革。主要的改革包括：（一）教育制度，考试制度的改革。传统的考试制在一九〇五年废除了，代之以新式的学校教育和新的考试办法。（二）扩大政府的基础，容纳在野绅士的意见。尤其是在日俄战争之后，立宪简直变成了公认的治百病的良药。在北京，进行了宪政编查，答应开国会，答应立宪；在各省，成立了咨议局。（三）在经济方面，《下关条约》规定通商各国能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兴办实业。中国本国的绅商也享有民办实业的权利。于是张元济，王云五等等绅士在上海办了商务印书馆；袁树勋，杨度等地方绅士在湖南兴办矿业公司；张謇在南通办纱厂，开垦盐硷地。当然许多没有功名的商人，实业家，甚至帮会里的人如杜月笙，也参加兴办实业。张謇在他的《张季子九录·实业录》里说他是“通官商之郎”。他从士绅（状